



一九八三年
“泉州历史与文化”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刊

泉州文史





闽版刊字第〇三七号

泉州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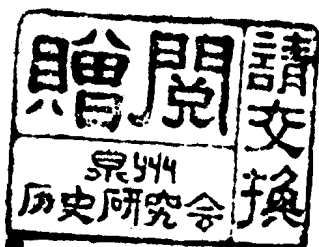
第八期

编辑者 《泉州文史》编辑部
(福建省泉州开元寺内)

出版者 泉州市历史研究会
政协泉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印刷者 晋江地区印刷厂

本期每册 1.00 元



泉州文史

第8期

目 录

海 交 史 讨 论

- 宋代泉州市舶司设立问题探索..... 傅宗文 (1)

闽 台 关 系 史

- 从族谱资料看闽台关系..... 庄为玟 王连茂 (11)
元朝澎湖巡检司隶属考..... 吴幼雄 (26)

乡 族 史

- 17 晚清泉州一个典型的世家——黄宗汉家族试探..... 陈盛明 (29)

宗 教 史

- 黄檗木庵禅师——赴日扶助隐元法化的泉州开元寺僧..... 沈玉水 (40)
泉州开元寺兴衰初谈..... 王寒枫 (51)
元代泉州方济各会遗物考..... 杨钦章 何高济 (62)

历 史 人 物

- 学事、候批、重游——从诗作看朱熹在泉州..... 何乃川 (74)
入台平倭患——沈有容在泉州的历史功绩之一..... 郑焕章 (81)
蒲氏兄弟之父——蒲开宗..... 陈自强 (86)

文 物 考 古

- 南安九日山摩崖石刻校记..... 李玉昆 (88)

方 志 考 述

略谈《温陵开元寺志》及其作者释元贤…………… 李秉乾 (96)

近 代 史

鸦片战争前夕泉州的鸦片走私和1840年的抗英斗争…………… 陈泗东 张家瑜 (105)

方 言 研 究

晋唐古语在泉州…………… 黄典诚 (110)

译 文

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 [荷] 伦纳德·鲍乐史 著 (121)
温广益 译

宋元时代泉州的发达与广东的衰微(续)…………… [日] 成田节男 著 (135)
庄景辉 译

文 史 简 讯

“泉州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综述…………… (150)

“泉州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目录…………… (153)

泉州历史研究会举行第三次会员大会…………… (157)

会 员 著 译 介 绍

《郑和》中译本即将出版…………… (158)

~

~

~

~

~

图 版 泉州古基督教石刻…………… 封二、封三

木庵禅师遗墨…………… 插图

宋代泉州市舶司设立问题探索

傅 宗 文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设立广州市舶司。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至端拱二年(989)间,又设立杭州、明州市舶司。之后,才又迟迟于哲宗元祐二年(1087)设立泉州市舶司。

一个有着海外贸易悠久历史的泉州港,市舶司的设立却格外迟缓。本文试对此扑朔迷离的历史问题,略作一番探索。

泉州海外贸易的历史很长。晚唐时节,便日趋繁盛。所谓“船到城添外国人”^①,勾勒出蕃客憧憧的热烈景象。从天祐年(905—907)中起,王延彬镇守泉州达二十七年之久,“仍岁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侍郎。”^②海外贸易更有了相当的进展。之后,留从效统治期间(947—962),鼓励海外经商的政策得到延续。“陶瓷铜铁泛于蕃国,取金贝而还,民甚称便。”^③后周显德年中,居然能一次向中原王朝贡奉白龙脑香一千斤^④。这期间,泉州城也自丰州谷地迁来新址后,首次加以扩充。“云室万家,楼雉数里。”^⑤並从此以刺桐城的美称播誉海外。留从效之后,陈洪进夺得泉州的统治权。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至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二年中,向宋廷贡奉五次。其中乳香等香料一项,即多达十五万七千斤,另有象牙七千斤,犀角二十五株,白龙脑二十斤,以及真珠、玳瑁、没药、阿魏、麒麟竭等贵重物品^⑥。显然可见,在陈洪进归诚北宋朝廷的前夕,泉州作为海外贸易港口的基础已经奠定,贸易数额也达到一定的水平。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8),陈洪进和钱俶相继纳土,估计为时不长,宋廷即设立杭

①《全唐诗》卷五五九,薛能《送福建李大夫》。

②佚名《五国故事》上。

③《清源留刘族谱》卷一《宋太师鄂国公传》。

④同上书卷二《浩敕》。

⑤同上书〔宋〕张赞明《宋太师鄂国公墓碑铭》。

⑥《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六——九。

从族谱资料看闽台关系

庄为玑 王连茂

前 言

谱牒作为几千年宗法社会的特有产物，它旨在通过载祖德，立族规，明宗支，分族从，一方面藉以增强“木本水源”、“敬宗睦族”的思想感情；一方面则在于宣扬封建伦理精神，让族权统治的绳索系结得更加牢固。虽然，这种记述以男性血缘为脉络的宗族世系之书，带有较大的封建性的消极因素，但是，由于谱牒所载的家族史，包含了诸如姓氏来源、家族兴替、人口升降、民族迁徙、风俗习惯、社会变故，以及族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活动等，其内容之丰富，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卷帙之浩瀚，实非他种文献典籍所能比拟。因此，历代史家编纂史籍，乞灵于官私谱牒者，实繁有徒。今天，在史学研究中，抢救与发掘谱牒资料，並持科学的态度加以分析、运用，乃是一项重要而前景光明的工作。

近几年来，我们曾致力于福建族谱的调查，迄今经眼者计一百五十余部，其中七十余部载有涉及闽台关系的资料，而以移民资料为最多，约十七万字。尽管这只是福建族谱中的一小部分，且族谱本身往往带有较大的局限性，但它所反映的各种真确而又具体的史实，不仅大大地有助于我们对于闽台关系，尤其是福建移民台湾问题的研究，而且为海峡两岸人民的寻根认祖，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爰据所得资料，分述如下：

（一）早期移民及其开基台湾的时间

福建人民移居台湾的时间，究竟始于何年，文献上确难找到具体依据。然可相信，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闽人之往台，当较他省为早。虽史称唐代浙江人施肩吾于元和元年（806）率族人到澎湖定居，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移民，但史学界持怀疑态度者颇有人在。目前见诸谱牒的最早移民，乃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德化县苏姓。据《德化使星坊南市苏氏族谱》七世祖苏钦于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撰的序文云：

“（苏氏一族）分于仙游南门、兴化涵头、泉州、晋江、同安、南安塔口、永春、尤溪、台湾，散居各处。”

晚清泉州一个典型的世家 ——黄宗汉家族试探

陈 盛 明

世家，指的是封建社会中门第高、世代做大官的人家。这种世代显贵的家族，早期多为拥有庄园采地的世袭贵族，《史记》把记述诸侯王的传记称为“世家”，孔子不是诸侯王，而司马迁以他“以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也列入“世家”。科举制度施行后，虽寒微之士，只要十载寒窗，一举成名，进入仕途，飞黄腾达，便可跻上地主官僚阶级之列，簪缨相继，构成一个世家，居于当地社会的上层。在外居官任职，一纸书札可以左右家乡的官府；回家作为乡绅，对地方上的一切便拥有发言权，地方官须另眼相待，敷衍周旋。所谓世家豪族的形成、发展与衰落，影响到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要了解当地社会历史的全貌，有必要对其进行考察、探讨，作为研究地方史的一个课题。

泉州这个地方，自唐以来，人文日盛，科第联翩，宋元明清翰苑的士夫，执笏的宦宦，绵绵不绝。明季有一时六相九尚书，两元十八学士的盛况；清代有祖孙父子兄弟翰林，父子兄弟同榜的佳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子孙席余荫，绳祖武，家族就昌盛起来。虽官有高低，绅有大小，能量不尽相同，而其地位特殊，不等于一般平民则一。当然，也有子孙不肖一两代而破败的，但多数门庭却能维持数代，保其世家。即使外强中乾，表面上还是油漆未褪，仍可粉饰一时。这种家族，泉州代有其人，找个典型来剖析一下，探讨其兴衰过程及对地方上的关系影响，对于泉州地方史的研究，不是没有意义的。

清中叶以前，离我们远一些，讲起来比较生疏，因此，选择黄宗汉家族作为标本来试行探讨。因为：（一）该家族的主干黄宗汉，为清中叶后官阶最高的泉州人，其家族后昆作为官绅，也多有一定地位；（二）这一家族的形成与发展，处在鸦片战争前后，正是中国社会性质趋于变化的时代，有特殊意义；（三）被称为“观口黄”（黄宗汉家住在泉州元妙观口）的这一家族，至今还为老一辈的泉州人所熟悉，较易理解，有其代表性。

据该家族世系，属于紫云黄分支，先辈移居泉州涂门外法石乡，世业农，兼作手艺（补鞋），后族中有转为商贩的，在莆田涵江一带行商，家以小康。其第八世，遂进城卜居集贤里（今打锡巷一带），建有住宅，送子弟读书，渐露头角。第九世起，编出宗族辈分十六字，即“荣耀祖宗贻谋孙子永承家庆世受国恩”。第十世耀字辈分为三房，长三西

黄 檗 木 庵 禅 师

——赴日扶助隐元法化的泉州开元寺僧

沈 玉 水

泉州与日本间佛学界的友好往来，见于史籍者应不晚于唐代。在随从鉴真东渡的十四位大弟子中，有“泉州超功寺僧昙静”^①。昙静在唐时已受具足戒，是鉴真弟子中“显名于后代”的十八位名僧之一^②。昙静在日本担任戒师，并设立放生池^③。宋嘉定十年（1217年），又有日本入宋僧庆政上人，留居过泉州。庆政归国时，曾带有福州版的佛经多部，并带回一部用古阿拉伯文写的诗歌集，称为“南蕃文字”^④。在鉴真渡日的九百年后，追随隐元禅师而先后赴日的泉州僧人有木庵^⑤、大眉、悦山、慈岳、雪机、东岸、喝浪、独文、大鹏、慈庵十人，其中木庵、悦山、独文、大鹏较为知名，特别是木庵在扶助隐元开创日本黄檗宗^⑥最为得力，他继承隐元的法席，成为日本黄檗宗的第二代祖师。今年（1983年）农历正月二十日（以下日期均指农历），是木庵禅师圆寂三百周年纪念，特写此文，就木庵的生平作概要介绍，以纪念这位为中日佛学交流和文化交流作过贡献的名僧。

① 淡海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

② 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上卷，第九章第二节。

③ 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转引《类聚三代格》。

④ 木宫泰彦，前揭书，下卷第二章第三节。庆政所带回的佛经有：《大般若经》、《大宝藏经》、《新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

⑤ 本文所指的是明末清初泉州开元寺的木庵，而不是宋代福州长庆寺（即西禅寺）的木庵。据《长庆寺志》卷二载，该寺的木庵为闽侯吴氏子，于隆兴元年（1163年）住长庆寺，乾道二年（1166年）移住鼓山，后终于泉州清果寺，回葬鼓山。又《福建通志·高僧传》记载同此。

⑥ 隐元禅师（名隆琦）在日本创立的黄檗宗，是临济禅宗的一个支派。隐元是临济宗正传第三十二世，于顺治十一年（日本承应三年）应清渡日弘法。当时，日本禅寺的规制和风气已很荒废。隐元到了日本创建黄檗山万福寺，传播黄檗禅，宣传“悟顿”、“见性成佛”禅旨，举行黄檗三坛戒会，整顿禅林规制，给日本禅界以新的刺激，而一振临济、曹洞之势，各派禅僧相继趋其门下。所以日本佛学界认为：黄檗宗这一门派的禅风，对于临济宗、曹洞宗来说，也放出异样的光彩。

学 事、候 批、重 游

——从诗作看朱熹在泉州

何 乃 川

南宋大儒朱熹（公元1130—1200）的父亲朱松字乔年，曾带兵镇守过泉州的石井，而他自己考中进士后，第一任就是泉州同安主簿，自此与泉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古泉州称之为“朱子过化之地”，有“海滨邹鲁”之称，传诵于海内外。朱熹或为官、或访友，足迹遍及泉南各地；他或读书讲学、或赋诗题辞，留下不少故事和遗迹。朱熹在泉南所作诗歌一百五十首左右，《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涉及泉南人物和事迹者屡见，兹选择数则略作述说。凡见诸《朱文公文集》中的诗作和文章，概不注明出处。

宦居泉南施教

宋理宗以后，地位不断被抬高的朱熹，遵循着自然发展规律，由童年、青年、中年到老年的发展过程，同样有他的欢乐和苦恼，生活在封建社会中，同样有他的偏见和矛盾。朱熹任泉州同安主簿时（公元1153—1157年），从诗作可以看到其青年时期思想的一个侧面。

《释奠斋居》云：“理事未逾月，簿书终日亲。简编不及顾，几阁积埃尘。今辰属斋居，烦渴一舒伸。……聊参物外趣，岂与俗子群。”虽然，他常有“何因不归去，坐使百忧侵”（《忆斋中二首》）之叹，但如《书事》一诗所述：“重门掩昼静，寂无人境喧。即此自为乐，何用脱笼樊。”以这种自得之乐来安慰自己，对于从小就想“圣人亦易做”的朱熹，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寄山中旧知七首》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客子归来晚，江湖欲授衣。路岐终寂寞，老大足伤悲。慷慨平生志，冥茫造物机。清秋鸣鹄上，万里看横飞。”这种“慷慨平生志”，“万里看横飞”的抱负，和“簿书终日亲”，“岂与俗子群”的思想矛盾，对于一个刚走上官场的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反映是比较真实的。

朱熹在《述怀》一诗中，有如此的表露：“夙尚本林壑，灌园无寸资。始怀经济策，复愧轩裳姿。效官刀笔间，朱墨手所持。谓言殚蹇劣，讵敢论居卑。任小才亦短，抱念一无

南安九日山摩崖石刻校记

李 玉 昆

南安九日山摩崖石刻是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石刻记录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其中十段祈风石刻,是研究我国古代海外交通史的珍贵资料,也是中外友好往来的实物资料。

以前记录和整理研究这些石刻的主要有:陈紫仁的《闽中金石略》、陈衍的《福建通志·金石志》、苏大山辑明黄季韬等撰的《九日山志》、宋唏的《宋泉州南安九日山石刻之研究》(台湾《学术季刊》第三卷第四期,一九五五年六月)、方豪的《宋泉州等地之祈风》(《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三期,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的《福建省石刻资料汇编》(油印本,一九五九年)、吴文良的《泉州宗教石刻》(《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七号,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八月)、吴文良的《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文物》一九六二年第十一期)、吴文良的《泉州九日山宋摩崖石刻》(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油印本,一九六四年)、庄为玠的《古刺桐港》(油印本,一九七六年)、黄柏龄的《九日山志》(晋江地区文化局、文管会出版,一九八二年)、林文明在《海交史研究》连续刊载的《宋代中外人民友好往来的重要史料——南安九日山祈风石刻浅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派黄天柱、李玉昆、黄宝玲、刘志诚四位同志组成调查组,前往南安丰州进行考古调查。我们又对九日山石刻进行一次复查,发现一些问题,略记于下:

一 九日山石刻的数字、分类和位置

九日山石刻的数字,吴文良在《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一文中说:“以上九日山东西峰上过去及现在已经被发现的宋人题名留字石刻计有庆历四年沈衡、蔡襄等的题字石刻三十六段。其中有关宋代泉州地方官吏和市舶司为‘蕃舶’举行‘祈风’典礼的题名记事石刻仅有十一段。”后来他在《泉州九日山宋摩崖石刻》中有详细统计:“现留存石刻七十四段,计宋刻四十八、元刻六、明刻九、清刻一,年代因风化剥落或不刻年代的十一段。其中以宋代泉州高级官吏和市舶使为‘蕃舶’举行祈风典礼的题名记事石刻最为重要,仅有十三段。”黄柏龄《九日山志》说:“现在实存七十五段。在这七十五段中,按时代分,宋刻最多。可以肯定为宋刻的四十九段,其中刻有宋代年号纪年的四十四段,无年号有纪年但志书载为宋刻的二段,无年号有纪年而《闽中金石略》作为宋刻的三段。(《闽中金石略》所收确系宋刻的仅四十一

略谈《温陵开元寺志》及其作者释元贤

李 秉 乾

一、《温陵开元寺志》

泉州开元寺始建于唐垂拱二年（公元六八六年），初名“莲花寺”，后改“兴教寺”、“龙兴寺”，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遂改称为“开元寺”。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至今有一千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开元寺的第一部“寺志”是明万历二十四年陈止止纂修的。这部寺志虽然“探考疏略，众中弗以为善”^①，但在明崇祯十五年释元贤纂修《温陵开元寺志》时，还是把它当作一部不可缺少的参考书。由于这部寺志早已失传，因此，释元贤纂修的《温陵开元寺志》便成为一部最古老、最完整的寺志。

据《泉州地方文献联合书目》^②载：有关泉州开元寺志的目录如下：

（一）《温陵开元寺志》，明释元贤撰，明刻本，厦门大学图书馆收藏，残本，存卷一至卷四。

（二）《开元寺志》，明释元贤撰，民国十六年重刻本，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

抄本。即据民国十六年重刻本传抄，福建省图书馆收藏。

这个《联合书目》没有标明开元寺志的卷数，即厦大图书馆藏本《温陵开元寺志》到底是几卷本？而泉州文管会和福师大图书馆重刻本又是几卷？这个问题在《联合书目》中是没有准确地反映出来。也许因为原来各家在著录时就不一致，其原因应追溯到《温陵开元寺志》的收藏者——清光绪末年南安藏书家陈国仕先生。陈国仕先生在该志封面这样题识：“虽残之又残，泉人少有此书，当珍秘之。明鼓山涌泉寺僧元贤纂修 大清光绪丙申十一月南安天白阁藏 温陵开元寺残本 明刊本”。並钤有“天白阁”、“南安天白阁陈璧堂藏”、“得此是宝”、“光绪丙申装池”等印章。因此，后人可能当作卷数不全来著录。而实际上《温陵开元寺志》是四卷本，厦大图书馆藏本也是四卷，不过卷一建置有缺

① 释元贤修志序。

② 泉州历史研究会编。

鸦片战争前夕泉州的鸦片走私和 1840年的抗英斗争

陈泗东 张家瑜

清初海禁森严，洋船来华贸易，只限广州一口，船艘“皆先到澳门零丁洋外停泊，随由虎门入口，行抵黄埔住船，始开舱取货，此旧规也。”^①福建并无开港通商，当时烟禁也极严，雍正间曾飭部议奏，贩者枷杖，再犯者边远充军。这时的泉州港和漳州月港，虽曾为海外交通贸易要埠，经已衰落，但海外关系还是藕断丝连。加以“泉州府属之厦门厅有海口六处，马巷厅有海口三处，晋江县有海口三十四处，惠安县有海口十二处，南安县有海口四处，同安县有海口十三处，金门有海口十二处，共计八十四处。”且“村村皆有小船，处处皆可通海”，以故“贩卖烟土，莫甚于泉漳之民。而本省开馆之辈，亦惟漳泉是赖。”^②因此，走私鸦片之事，时有所闻。早在雍正七年（1726年）七月，漳州知府李治国曾抓获一起私贩鸦片三十四斤的行户陈远案件，是运桔饼至广东易贩的^③。嘉庆十四年（1809年）八月，闽浙总督奏泉州海盜蔡牵事，有“该逆素食鸦片”之语^④，蔡牵对鸦片应是吸贩並有的。道光初年，福建贩制的鸦片，有名于时，称为“建浆”^⑤。当时福建政和人宋滋耆《闽中吟》十首之一《阿芙蓉》中说福建“愚民每嗜之，有如茶蓼虫。岁久隐成病，欲戒难为功。夷人日以富，华人日以穷。”可见福建在鸦片战争之前，吸贩鸦片为祸之烈。

“嘉庆十九年（1814年）以前，闽洋从无外船游驶。其后鸦片渐行，漳泉奸民勾引，遂公然驶至。文武员弁庸懦者不敢攻击番舶，阳收持重之名。”^⑥这就是鸦片战争前夕福建鸦片走私猖獗的原因及情况。泉漳海口是当时英国鸦片船停泊之处，泉漳奸人私贩鸦片是

① 神州国光社出版《鸦片战争》第四册《道光朝外洋通商案》。

② 沈汝瀚《戎马风涛集》卷六《禀查办鸦片烟土及各处海口情形》。

③④ 雷瑨《蓉城闲话》。

⑤ 梁晋竹《两般秋雨庵随笔》。

⑥ 《清史稿》卷三十九，陈化成传。

晋唐古语在泉州

黄典诚

引言

泉州是个“花锦山川”的胜地，而今已经光荣地被列为全国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了。泉州之所以取得如此峥嵘突兀的地位，人们一般只知其建城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宋元两代是世界重要的商港之一，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她还拥有诸如开元寺、东西塔、老君岩、清真寺、圣墓、洛阳桥、九日山等名胜古迹。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其它二十三名城所未具而为泉州所独有的特点，这就是这个文化历史名城还保存了一系列晋唐乃至更古的古汉语的遗迹。

语言借声音为物质外壳，虽然出口即逝，难以保存；但语言又靠文字为传播工具，不但可以行远，且能传世。我们说泉州古城保存了大量的古汉语，这不是一句哗众取宠的空话，而是有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确凿的证据。

一、语音的残余

晋唐时代汉语的语音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模型，这是不难稽古而知的。研究中国音韵学的人，无人不知在隋朝仁寿元年（公元601），魏郡临漳人陆法言曾写下一部根据汉晋洛阳雅音以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韵书——《切韵》^①。唐人韵古沿今，奉为典规，基本不变。《切韵》之后的韵图家分析了《切韵》的内容，让《切韵》以图表的形式出现于人们的眼前，使人们一目了然其书内部声、韵、调交相配搭的全貌。《切韵》声母共有四十一个，韵母约有三百三十个。既分四声，又别四等。我们要论证泉州古城多古音，就得拿它和《切韵》这些方面一一地比较下去。

首先比较声母——《切韵》四十一声母，韵图家似乎自发地遵守音位学的原则，竟以

^① 参见拙作：《切韵的作者陆法言》，上海《辞书研究》1981年第4期，

《切韵性质的探讨》，《厦门大学学报》（文史版）1982年第3期

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 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

[荷]伦纳德·鲍乐史 著 温广益 译

译者按：本文作者伦纳德·鲍乐史(Leonard Blussé)是荷兰莱登大学历史系欧洲扩张史研究中心的硕士研究员，1980年底至1981年初前来我国期间，曾到我省访问并进行学术交流。本文以英文发表于1979年出版的《群岛》(archipel)第18期，收入这一期的主要为有关“南海的贸易与航运”方面的论文。本文主要探讨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1602—1799)我国与巴达维亚之间的贸易关系，指出当时“作为东亚最大的贸易公司总部的巴达维亚的日益繁荣，实际上大部分是依靠每年伴随东北季风开来的中国帆船所载来的为印尼市场所需要的各种商品所致”。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福建与巴达维亚的贸易联系”，第二部分叙述“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帆船贸易”。文章引用了不少当时的原始材料，对研究当时我省、特别是厦门地区与巴达维亚等地的贸易关系，它的繁荣及衰落的原因以及福建华侨的出国等，有一定的资料价值，故译出，以供参考。文章中有某些观点是为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如文章提到“红溪惨案”发生的原因时归结为“这个无法控制的华人劳工移民导致劳工骚动，而结果引起1740年的华人叛乱”(这也是西方学者较为流行的观点)。其实引起1740年荷兰对巴城华侨的大屠杀，主要是由于荷兰殖民者对华侨执行一条从利用、限制到打击政策的必然结果，因为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成立的那天起，就竭力推行垄断一切的政策。文章中经常将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简称为公司，希读者在阅读时加以注意。译文有不当之处，亦请指正。

以往很少有人写过关于十七和十八世纪时期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海上贸易，而且实际上被认为完全没有什么价值提及关于华南——主要是厦门地区——巴达维亚之间的中国帆船贸易，这确实使人感到惊奇。这个看法或许会使东印度公司历史的热衷者感到沮丧，但是二百年来，作为东亚最大的贸易公司总部的巴达维亚的日益繁荣，实际上大部分是依靠

“泉州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综述

今年元宵前后（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一日），在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市，由泉州历史研究会、泉州师专联合举行了“泉州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到会的有北京和本省科研单位、大专院校长期研究泉州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有关刊物编辑部、出版社的代表，还有业余史学工作者以及该会会员等共二百二十一人，收到的论文有九十四篇。这次学术讨论会，内容比较丰富，涉及面也较广，老中青史学工作者欢聚一堂，交流学术研究成果，是泉州地方史研究工作的一次盛会。

现将讨论会的论文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海外交通史和外来宗教的研究方面

泉州是我国宋元时期世界著名的贸易大港，研究泉州港的海外交通和外来宗教传入泉州的历史，是这次讨论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宋代市舶司的设置问题：宋代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为什么比广州、杭州、明州要迟百年左右？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次讨论会上有的论文就此问题作了论述，说明北宋初年至元祐二年的百余年间，因泉州地区发生农民起义，朝廷实行严厉的禁榷法和舶货仓买制度，北宋政府和高丽关系冷淡，泉州至汴京陆路交通险阻，王安石变法派人物、市易司大臣吕嘉问反对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广、杭、明三州排斥泉州等等，致使泉州市舶司迟设。直到哲宗元祐间，泉州由于人口增长，农业生产不能适应人民生活的需求，促使工商业和海外贸易飞跃发展，加上王安石新法被废，“元祐更化”开始，曾在王安石任相时被贬逐的李常，得到明堂赦书后，立即条陈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在这种形势下，朝廷才诏准泉州增置市舶司。这种见解为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开辟了一条途径。

蒲寿庚问题：对于在宋末元初促进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发展最力的蒲寿庚，国内外学者均据《宋史》“擅蕃舶之利三十年”之说，认为他在南宋提举市舶司三十年。这次有的论文就南宋委任市舶司使的惯例和蒲寿庚卸梅州太守返回泉州的时间，考证了蒲寿庚在南宋出任市舶司不过七个月，实际上是在南宋擅蕃舶利三十年。另外，有的论文对广东甘蕉《蒲氏家谱》、泉州《蒲氏族谱》、何乔远《闽书》所载以及有关资料的研究对比，提出蒲寿庚的父亲不是由四川迁来的蒲仕宾，而是从广州迁来的蒲开宗。这是蒲氏研究中的两点新的看法。

泉州地区的回族：晚唐五代以来，不少中亚、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的“蕃客”由海路来泉州经商传教，他们聚居在泉州城南，与当地汉人杂处通婚，到元代便形成了一支新的回族，成为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这次有的论文考证了蒲、郭、金、夏、

《郑和》中译本即将出版

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寺田隆信先生著述的《郑和》一书，由厦门大学历史系教师、我会会员庄景辉同志以晓畅的文笔翻译完成，即将由（北京）海洋出版社出版。

郑和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航海家，在明朝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二十九年间，先后奉命统领近三万舟师，七下西洋，出使亚、非三十余个国家。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空前壮举，也是中外关系史、海外交通史、航海史、造船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开展对它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正在掀起新的“郑和研究热”，在这种新形势下，把此书翻译介绍给我国的广大读者，对于推动国内的学术研究，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该书于一九八一年由日本清水书院出版。作者寺田隆信，长期致力于郑和的研究，并曾于一九八二年亲赴云南省瞻仰郑和故里及其先人坟墓，阅览有关的原始材料。《郑和》一书共分四章，包括序、跋和年谱。第一章论述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第二章和第三章在介绍郑和的身世、出洋的船队的组织之同时，利用中国以及伊斯兰方面的新史料，以大量的篇幅叙述了郑和率领船队出使的时间、航线及国家，与各国展开贸易活动和友好往来的状况；第四章说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产生和停罢的原因，航海术和造船技术的成就以及下西洋的影响和在国内外的遗迹等。全书约十万字。

作者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唐宋以来“海上陶瓷器之路”兴起，对外贸易兴盛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在中国与东南亚、印度、西亚乃至非洲东海岸诸国的频繁交流这样广大的历史背景下，基于十五世纪初明帝国的富强和国威而进行并取得成功的伟大事业。这决不是偶然的事件，也不是个人的冒险事业。作者批驳“郑和西征”说，指出郑和在下西洋的整个过程中，郑和虽采取某些军事行动，但完全是为了排除妨碍贸易的势力，主要目的在于通商。作者还指出，中国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友好通商的姿态，是海外各国所欢迎的。这些国家与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交易关系，他们把郑和率领中国船队的到来，看作是加强这种传统关系的象征。这为郑和七下西洋成为可能提供了条件。郑和下西洋到达了十六世纪以降欧洲新兴势力登上亚洲海域的舞台之前，中国与海外诸国通商和密切往来这一航海历史阶段的高峰。

作者还认为，郑和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而且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先驱者。当欧洲的商队在郑和所活动的海域上露出帆影，那已是在其八、九十年之后，即所谓的“大航海时代”。就亚洲海域而言，他们的航海事业也只不过是追寻郑和的航迹而进行的。郑和的航海活动，无论是范围之广阔、船队之庞大，还是造船技术和航海术之先进，都为伽玛、哥伦布、麦哲伦所望尘莫及。

总的来说，在内容、形式、观点方面，本书均不失为一部较好的著作。此书译毕，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所长韩振华教授为本书写了前言。书末还附录有译者搜集的本世纪以来中（包括台湾及海外华文报刊）、日、英文有关郑和研究的论作目录。（东阳）